

16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

4

HENAN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

第四辑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
委员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

第四辑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郑州新予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54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50

统一书号 3105·463 定价0.8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直南五县党的建立与发展……………安 明(1)
- 党领导沙区群众的革命斗争……………刘汉生(19)
- 回忆濮阳的革命斗争……………赵纪彬(34)
- 中国共产党领导濮内滑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王从吾(45)
- 我党领导濮阳两门一带的灾民斗争……………田 园(58)
- 中共鄂豫边区党史资料补遗……………董中玉(70)
- 坚持革命就是胜利……………王国华(100)
- 从鄂北回泌阳的回忆……………张旺午(105)
- 从中央苏区到鄂豫边区……………周骏鸣(110)
- 从豫南到淮南……………牛德胜 王善甫 刘铁华 张万合(129)
- 峥嵘岁月……………李子健(155)
- 回忆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春河南地下党的情况
……………吕文远 刘 晋(174)
- 威振豫晋边区的游击战争……………段德文(196)
- 后记……………(212)

直南五县党的建立与发展

安 明

我今天谈的是原直南五县^①党组织的建立情况。这个党组织的建立与大名七师分不开。七师建立于一九二三年秋，第一任校长是谢台岑（濮阳人，清朝末年秀才，河北保定高等师范毕业）。他是省议会的议员，他在议会上一一直争取要在大名成立个师范学校，后来省议会通过，北洋政府批准，成立了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大名，故简称大名七师。七师一成立，清丰的晁哲甫、南乐的王振华就在那里当教员。一九二六年晁哲甫当教务主任，王振华任训育主任。当时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的思想倾向民主，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军阀混战是不满意的。一九二四年直奉二次战争，冯玉祥倒了吴佩孚的戈，建立了国民军。此时在七师学生中曾引起一场争论，有的人说，冯玉祥很坏，有的认为则不然。吵来吵去，谢台岑就知道了。谢是讲历史课的，有一次他就在课堂上讲，袁世凯倒了满清的戈，段祺瑞倒了袁世凯的戈，吴佩孚倒了段祺瑞的戈，现在冯玉祥倒吴佩孚的戈，有什么稀罕呢！倒戈好，不打仗，少死些人。他是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倒戈的。谢台岑对军阀不满，他从爱国的观点出发，主张教育救

^① 现在豫北的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原属河北省，人们习惯称为直南五县。

国，努力把学校办好。在教育思想上，他受杜威的影响，坚持一面实验，一面学习。谢台岑、王振华、晁哲甫受“五四”运动影响比较大。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七师学生曾联合大名的十一中、五女师、第一、二高级小学等，组织罢课，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上街游行示威，开会演讲，宣传抗英。学校的这些活动，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是支持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是开始北伐。不久，北伐军打开醴陵、长沙，这时两湖的农民运动就都起来了，援助北伐军，参加北伐。七月份冯品毅曾经到过七师，校长谢台岑领着他在学校转了转，并给学生介绍说，冯品毅是“五四”时的活跃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都很敬仰他。听说暑假后他要来七师当教员，我们都很高兴。九月份开学后，冯品毅果真来了，教我们的英语。同时进行党的宣传活动，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过大革命发展的形势。这时革命形势发展更快。在汀泗桥、贺胜桥打了两个胜仗，把吴佩孚的部队击溃了。北伐军九月六号收复汉阳，八号收复汉口。于是北伐军合围武昌，到十月十号，就把武昌收复了。吴佩孚的武力被击溃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沿平汉线南下，来到河南。前线在豫南、豫中。指挥部在郑州一带。

十月份，我们知道冯品毅将要离开七师。一天晚上，我跟赵纪彬讲：听说冯老师要走了，他走以后，我们再找党的关系就不容易了，临走前让他介绍我们入党吧！赵纪彬同意了。我们就给冯老师写了封信，大意是：我们想参加革命活动，希望冯老师介绍我们参加党的组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语言是很恳切的。冯品毅看后，把我们两个叫到他的屋里，就问我们：为什么要入党？我们就讲：因为对军阀不满，对社

会不满。要改造它，只有革命，除此没有别的出路。而革命，唯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要求参加党的组织。当晚，冯品毅就同意了我们的入党要求，并把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的最终目的、党的名称代号等都给我们讲了，还告诉我们通信密写的方法，最后还告诉我们河南省委的通讯处即开封东大街天主教堂×××（名字记不清了）转。回宿舍后，我和赵纪彬就给我们最好的同学李大山讲了这件事，也就是当晚发展了李大山。第二天又发展了成润（现在水利部工作）、吴益普。于是就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我。冯品毅走前还让我们订一份报纸叫《华北新闻》，他说这是国民党左派的报纸，它的态度很明朗，观点很鲜明。

三天以后，冯品毅就走了。我们就给河南省委写信联系，没见回音。我们就在七师活动，把有关北伐战争的新闻写在黑板上，进行宣传。

放寒假前（即一九二七年元月），我们在七师又发展了十几个党员，现在记起来的有：南乐的石仙洲、朱子欣、李渭川、王师韩；大名的解蕴山、裴志耕（现在空军政治部当顾问）、甄宅西（现在内蒙古工作）；长垣县的郭义安；巨鹿县的李亚光；还有吕鸿安等。这时党支部书记换成了赵纪彬，我是组织委员，李大山是宣传委员，成润做团的工作。

放寒假时，我们布置了工作，要求党员在假期里要在农村进行宣传，发展党的组织，我在南乐县发展了刘峰，其他发展的都是谁，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同年二月，七师开学，我们继续在学校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跟王振华（训育主任）在一起谈话，就告诉他，我们参加了政治活动。王振华知道后，就给谢台岑、晁哲甫

讲了。随后谢台岑就对我说，你们是否到武汉去受训。我们感到去受训好，因为我们入党的几个人，一是马列主义水平低，革命理论差，马列的书就没有怎么看过；二是没有实践经验。我认为，我们参加革命是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卷进来的。于是我们同意到武汉（当时的革命中心）去受训。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各拿出七十块钢洋交给了我们。我们把工作交给了成润、吴益普两人。我和赵纪彬、李大山三人准备去武汉学习。我们首先到北京找到了李素若（此人是赵纪彬的同学、好朋友，已经参加党组织，住在府右街罗圈胡同甲字14号），让他为我们去和北方区党委联系。我们就把我们的情况和要求写成报告通过李素若送上。三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李素若领我们到政法大学的宿舍里见到了刘伯钊，刘说：“组织决定，你们三个人，只准有一个人去武汉学习，其他两个人回大名坚持工作。”谁去谁回呢？我们三个商量后，决定我去武汉，赵、李回去。我们就给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写信，说明我们求学有困难，想回去。谢等收信后马上给我们发了电报：“在京求学既有困难，速回。”

四月初，赵纪彬、李大山返回七师，谢台岑就问赵纪彬：“你们参加的到底是什么党？如果是国民党，我看他革命不彻底。”赵纪彬说：“我们参加的是共产党。”谢说：“你们参加的是共产党，我们也可以考虑参加。”谢、晁、王商量后，同时由赵纪彬介绍了党。

我从北京出发，经天津，然后乘船赴上海，准备先去找冯品毅。途中遇到杨天然（后知他是北方区委的交通），他认识冯品毅，于是同行到达上海，住在江南大旅社。第二天到黄埔路一号（这是冯品毅在上海的通讯处）找马恕（冯品毅的化名），警察不让进去，我只好走了。当天在报纸上看到，黄埔路一号是苏联

领事馆，已被包围搜查。两天后，我就乘船到了武汉。后来才知道，那天正是“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缴了纠察队的枪，叛变了革命。

到武汉后，我先找到了王虞传（冯品毅走后，他接任我们的英语课，冯在上海的通讯处，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又到顺直省委驻武汉办事处找到李希夷。这时正在准备开“五大”，北方区的代表证明我是党员，就给我写信，让我去找屈楚豪，屈楚豪介绍我到中央农讲所学习。当时，农讲所的负责人是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教育长是周以栗。学员按军事编制，开始学军事多，后来讲课比较多。恽代英、邓演达等人给我们作过报告，毛主席讲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前后，夏斗寅偷袭武昌。这时武昌比较空虚，因为武汉的部队已出师河南。夏斗寅乘虚而入，他的部队一直打到离武汉四十里处的纸坊附近。武汉为应付紧急情况，组织了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两千多人，中央农讲所的八百多人组成），师长叫侯连瀛（河南人），恽代英是党代表。独立师由叶挺率领（当时叶挺是武汉的卫戍司令）开到纸坊，打了一仗，把夏斗寅打跑了。这次，我们农讲所的学员没有去，只是整装待命。白天，我们上课、打靶，搞军事训练，夜里到城墙上担负从农讲所到北门一带的城防。六月下旬，我们毕业。这一期，河北省的学员，只有我和杨恒南（河北完县人）。

我在农讲所毕业以后，又按原路返回。先到顺直省委，省委派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大名工作。这时大名正在打仗（驻守大名的是直鲁联军孙殿英的部队，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三军梁寿凯率部前来攻打），我没有直接去大名，便绕道去南乐了。因为北伐军已经到了南乐一带，所以濮阳、清丰、南乐等县的国民

县党部都已经公开了。其实，县党部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党员在那里工作，真正的国民党员很少。到南乐后，我住在县党部。梁寿凯率部很快就退却到了新乡，孙殿英的部队又占领了濮阳、南乐这一带，这已是八月份了。在此之前，武汉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时隔半个月，我党又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我在政治上搞不清楚，因为农讲所毕业后，我离开武汉时，武汉国民党政府加紧准备公开反共及宁汉合流等情况我不知道。究竟怎么搞我们的工作，我弄不清楚。我就到新乡找到汪静函（中共党员，当时系梁寿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让他给我弄了一套军衣穿上，去临颍找张本固（又名张培深，农讲所同学，当时是中共党员，我们在一个党小组里。毕业时，我让他把我的书带到他家了）家拿我的书。张本固给我讲，“两河书店”是开封党组织的接头处，张和尚在那里，并给我讲了那里的代号。我回新乡后就把张本固告诉我的情况又告诉了当时也在新乡的谢台岑。谢台岑穿了一身军衣（营级军服，是借的）到开封去找张和尚。张和尚接见了，并把他引见给周以栗。周以栗给谢台岑讲了“八七”会议精神，大意是：要举行秋收起义，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只要各地都起来搞暴动，国民党就没有办法啦。“八七”会议以后各地究竟如何搞，周以栗没有具体讲，也不可能具体讲。

在新乡，我听同学王建章（此人与冯品毅很熟，是个团级军官）说，冯品毅病倒在信阳，冯给他的好同学、现任梁寿凯部团长的齐立平写了封信，内容是：历年奔波，给这些混小子们做了嫁衣裳，我现在病倒在信阳客店里……。齐立平接信后，派干部（并带了二百块钱）到信阳把冯品毅送回大名。

从临颍回来后，我和当时也在新乡的赵纪彬、成润、石仙洲等同志带着从临颍取回的书一同回到井店镇。在南门里小学找到

喻屏（他在此校教书），就在一起商量今后应该如何工作。结果，让我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今后活动是否还用国民党的名义等问题去请示顺直省委。我到南乐后，还没有走，就收到了顺直省委寄来的一卷报纸，我就赶快用药水洗，洗后，一看是“八七”会议文件，有告全体党员书、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关于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通知等。我就不再去省委了。

我带着文件去找赵纪彬，和他研究文件精神，并把王从吾、五卓如、喻屏、刘汉生、蔡兆林找来，一起商量如何贯彻执行“八七”会议文件精神。大家认为，我们还没有多大力量，组织暴动恐怕暴动不起来。就决定在我们这里组织农民夜校，通过夜校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发动工作。千口、化村、井店都组织了夜校。“八七”会议的文件就是这个时候传达到那一带党组织的。时间大概是九月下旬。

一九二七年十月份，大名、濮阳、清丰、南乐这几个县共同成立个领导机关——中共大名地方委员会。我任书记（后赵纪彬任书记），赵纪彬搞组织，李大山搞宣传，成润搞团的工作。刘峰也参加了委员会。从此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招牌了，我们用《海陆丰农民运动》小册子上介绍的经验，开始在千口、化村等村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赵纪彬、李大山都到南乐我家（佛善村）去住，大名的领导机关就算搬到南乐了。这时主要是领导组织一些经济斗争，如年关卖公地，向富户借钱等，并组织人参加红枪会。一九二八年初，党的机关又搬到大名七师。同年二月间，我带着报告（关于成立大名委员会后的领导分工，开展工作的情况等）到了顺直省委（在天津），是蔡和森同志和我谈的话，他说，直南的党是有基础的，直南是几省交界的地方，工作很重要。回来时，我带了些文件，有瞿秋白的

《机会主义史》等书。我先到冯品毅家（此时冯在家住，精神已有些失常，因为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很信任他），把带回来的文件都给他看了。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开始，顺直省委改为河北省委。九月间，省委通知我在指定的地点派人与我谈话，我按通知的要求准时到达。这次跟我谈话的是彭真同志，谈后还让我带回一份“六大”文件，并让我给磁县党组织带去一份，此后，我们与磁县党也有了联系。回到大名正是中秋季节，第二天我就回家了。南乐的秋收斗争基本上没搞成。而井店一带的工作有进展，喻屏、李大山、赵纪彬都在井店镇教书，李世英在那个学校做饭。领导机关又从大名搬到井店，还出了个刊物叫《白杨书札》，实际上是党的通讯。“白杨”是濮阳的谐音，当时井店属濮阳管，“白杨书札”就是濮阳书信。

一九二九年一月，学校放假，我们就领导了对蔡鸿宾的斗争。在开展这次斗争以前，我跟赵纪彬、李大山、喻屏一起商量过，要利用一下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因为这次是跟带枪杆子的人作斗争，万一发生问题，可以让他们打个掩护。我就给县党部（当时李素若、平杰三均在县党部工作，章致平也在。章致平是代表省党部来指导濮阳县党部工作的。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湖北省农协干部训练班当学员。我在农讲所时和章来往过）讲：“我们斗争蔡鸿宾，如果出了事，就说是你们的农民协会在开会哩！”他们答应了。我们还讨论，斗争蔡鸿宾，蔡兆林（蔡鸿宾之子）在场是否会出问题。有的同志讲，让我把他带到南乐去；有的同志认为，斗蔡鸿宾是一般的清算问题，不至于出大事，我就没把他带走。结果蔡兆林叛变了。

学校放寒假后，我回家过春节，所以温邢固事件发生时，我

不在场。

正月初八、九，喻屏到我家去，他告诉我，初六在温邢固开大会斗争蔡鸿宾时，赵纪彬、刘汉生、李大山、王卓如四同志被捕了。这时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出来讲话，说是他们的农民协会在那里开会，土豪劣绅破坏农民协会。于是，就把温振刚（大地主）、杜金声（民团队长）、蔡鸿宾（蔡兆林之父）、蔡兆林四人也同时抓了起来。

四月下旬，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又被（从濮阳）押到大名，由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审理此案。据赵纪彬讲，他们到大名后，谢台岑、晁哲甫拿出六百块现洋，让晁哲甫去北京、大名等地活动，其目的是让把案子判得轻一些。当时判罪的主要证据是“白杨书札”（是蔡兆林叛变后供出来的），上边的字又是李大山写的。李大山为了避免对笔体，他又改写别的字体了。法院审判时，我们请的律师是我和赵纪彬的同学的父亲。他就辩护说，中国字不好讲，说它象某个人写的，它就象。说它不象某个人写的，它就不象。因为写某一种字体的人很多，不好辨认。结果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判赵纪彬、李大山各三年徒刑。刘汉生和王卓如说是去看热闹的，结果他俩是取保外押，随传随到。

一九二九年四月间，陈潭秋同志来直南检查工作，在邢台城西南郭小庄张信卿家里召开了一次会，我没参加（因没来得及通知我），成润参加了。会上确定成立邢台中心县委，书记是冯和斋（冯是保定二师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失败后经香港，转至上海，后又回肥乡县老家，接上了组织关系，参加了邢台会议），我是组织部长，郝耀星是宣传部长。这个中心县委实际上是直南特委的前身。领导直南十几个县的党组织，有南宫、隆平、邢台、

任县、肥乡、巨鹿、南和、邯郸、磁县、大名、濮阳、清丰、南乐等县。五月我到邢台中心县委去了，这时的工作是贯彻“六大”精神，组织群众，积蓄力量，进行日常的合法的、非法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春节期间，我们在井店搞了一次一千多人武装游行示威，来纪念温邢固事件一周年。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张含辉（张曾当过陕西省委书记，这时是从河北省委来帮助直南工作的），王从吾和刘玉峰都参加了。这次斗争胜利了，它大长了群众的威风。

同年一月，王卓如、刘汉生到邢台中心县委去了。这时大名法院又传讯他俩，赵子云就到邢台去叫。我没有让刘汉生、王卓如到大名去，因为恐怕把他俩再押起来。也没让赵子云回去。

四月份，邢台中心县委遭到一次大破坏，王近端、郝耀星、王卓如、赵子云、张信卿、张绍先（张信卿的弟弟）等十几个同志被抓走，押送到太原监狱去了。

同月，河北省委派郝青玉到直南去成立了直南特委，特委书记是冯和斋，我是组织部长，王子青（“六大”代表）是宣传部长，喻屏是秘书长。其领导范围仍然是邢台中心县委时的范围。

也是在四月份，立三路线的精神传达到了直南，我们就开始组织岳城暴动，由王子青直接领导。五月一日，岳城举行暴动，参加者有一、二百人，只搞了一天多，大家不愿意干，就散了。郝青玉、冯和斋就说王子青是右倾机会主义，解散红军。结果给了王子青停止党籍一百天的处分。岳城暴动是立三路线在直南执行的开始。

五月份，冯和斋、郝青玉又到大名去贯彻立三路线。到七师后，他叫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各拿出六百块钱给学校买枪。

谢台岑等担心买枪放在学校，万一学生出了危险，不好交待。同时，他们对立三路线也有看法。认为，当时客观形势好，蒋阎冯大战，对革命有利。但革命力量薄弱，要在直南组织总暴动是不行的，没有基础。冯和斋、郝青玉就说谢等三人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反对总暴动。不经特委研究，就把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开除出党。当时郝青玉“左”的了不得，直南特委办了个刊物叫《直南红旗》。郝要求凡是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都要署真姓名，我不同意，认为那样做是自我暴露。因为多数都是本地人，一署真姓名就都知道了。郝青玉还强调，凡是党员都得到街上去撒传单。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王从吾去大名十一中撒传单，还没有撒就被抓住了，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来找人的。这时，正好被王振华碰上，王振华说王从吾是他的学生，才算解了围。王从吾才被王振华安全带回了七师。其实王振华也是去十一中撒传单的。

这一时期，直南特委机关主要在磁县和码头镇一带，王维纲同志（最高法院副院长）在第三高小当校长，龚受益、董兆林两同志任教员。这个学校便成了我们的主要联络点。

五月间，我们在南乐县准备搞麦收暴动，就是抢地主的麦子。当时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只有红缨枪两百多杆，有组织的群众数百人。农民党员也比较幼稚，也不注意保密，没有到麦收的时候就传出要抢地主的麦子啦。地主知道后，就向伪县政府告发，伪县长孙振邦就纠集全县地主武装（民团）把我们村（佛善村）包围了，抓住了村党支部书记吴书升，组织委员潘斌，宣传委员刘介寿。吴书升（也叫二铁头）表现很坚强。他头一天刚结婚就被抓住了，敌人拷问他，他什么也不说，凶残的敌人就对他压杠子，压昏过去，再用冷水把他泼醒，继续问他。他带着对敌人的刻骨

仇恨，以非常蔑视的口气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并且一直骂那些坏蛋。最后，万恶的敌人就把吴书升同志惨杀在村外的东窑坡上^①。两个支委被打以后，供出我是他俩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我在濮阳工作，没有抓到我。

七月份，河北省委派张兆丰同志去磁县彭城搞暴动，没有搞起来。

同月，我和冯和斋、郝青玉到濮阳化村，准备在濮阳搞暴动，从峰峰矿调来一个火车司机叫赵凌云，由他做了些土炸弹，一共有几十个。没有枪支，就托熟人借了一支驳壳枪，有六发子弹，还弄了一支八音，有五发子弹。这么两支枪和几十个土炸弹，就想拿下村民团。郝青玉说，只要枪一响，成百上千的人就都来了，这话很不切合实际。当时村民团有三十来支枪，两方相比，武装力量悬殊很大。所以把人集合起来，没敢动就解散了。结果濮阳暴动也没搞成。

一九三〇年冬，我离开濮阳到磁县兼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阮啸仙同志在磁县召开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批判立三路线。王从吾和特委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当时我就讲，开除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的党籍问题值得重新考虑。这样特委书记冯和斋就批起我来，说我“是以右倾机会主义来反对立三路线，已经陷入了谢台岑、晁哲甫、王振华的右倾机会主义泥坑。”结果，我在党内受了“最后警告”处分。我虽然写了检讨，承认自己是右倾，但思想上是不通的。

总之，直南特委虽然执行了立三路线，但由于彭城、濮阳等

^① 杀害吴书升同志的是伪县长孙振邦，后调磁县继续惨杀我党同志，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地的武装暴动都没搞起来，所以立三路线在直南也没给工作造成大的损失。

一九三二年秋，磁县的小车社暴动也失败了，王维纲、唐老寿父亲和马戟等十几个同志被捕，送至北京监狱。高克林到滑县、濮阳一带搞盐民斗争去了。

一九三三年，特委在南乐县北五花营刘怀安家开了一次扩大会议，王从吾、王子青都参加了，会议主要是研究盐民斗争情况及今后如何继续工作。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到六河沟做矿工工作，七月份在六河沟被捕。因为我身上带了一些写的小标语，署名是中共六河沟矿支部，被搜出来了，以此为据把我抓了起来。审问我时，我说，我不认字，是得了两元钱替别人散发的，就把我送到安阳看守所。在那里我始终一口咬定我不认字，是得了钱替别人散发的原供。快到一九三四年春节了才判决我。法官是可照常（滑县人），他在判决书上写得比较婉转，结论是：“持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宣传品，犯罪事实未遂不罚”。宣布无罪释放。春节前三天，我才回到了家。回家后，我就让家里人给我造舆论，说我是因吸毒品在外边打官司啦。就这样，我才在家过了个春节。

一九三四年阴历二月初二，南乐县委被破坏，县委的王同兴、宋同法、陈仰贤三人被捕。他们三人是被骗出来以后被捕的。敌人派人赶了一辆马车，到南乐县委去叫他们三个人，诡称上级来人了，在大名开会，叫他们三人去参加。三个人就上了马车走了。途中遇到王从吾，三人就给王从吾打招呼，让王从吾也上了车，走到卫河叉河嘴渡口，马车停下来，在一个小茶店里喝水等船，王从吾就悄声问他们三人：“来接你们开会的人带有信吗？”答：“他们没有带信，身上都带有枪。”王从吾感到可疑，就警惕起